

何种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解释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

[澳] 丹尼尔·索卢卡 (Daniel Sorluca)

李 沉 译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以文明理论解释中国崛起是最有力的。文明分析是理想中解释中国崛起的最好理论，但遗憾的是，在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中，文明分析始终被边缘化，而中国是一个以民族国家形态出现的文明型国家。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理论中描绘的国际环境主角始终是主权民族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解释中国）都是不充分的，因为中国不仅是单纯的民族国家，而正如张维为提出的，中国之崛起应被理解为一个集世界最古老的连续文明与超大型现代国家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之崛起，它是自身数千年历史中“百国之和”的产物。^①

大多数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都以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为视角展开。然而，这两种理论都不足以解释中国崛起。它们陷入了二元对立的陷阱，不是用积极的就是用消极的绝对化的眼光看中国，造成西方对中国思考呈现出一种范式：要么认为中国是威胁，要么认为中国是机会。然而，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并没有考虑到久远文明的视野。将这些理论投射到中国，结果是内容丰富，却异常狭隘和片面。当然，我们不能说在中国的国际关系政策中找不到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元素。恰恰相反，笔者认为最能引起中国人思想共鸣的基础国际关系理论正是古典现实主义，但显然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并不受限于这样的理论。

笔者的观点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法阐明中国的崛起，因为它们未能充分解释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地位。相反，文明型国家（这一特质）决定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本身。在国际事务中，应当回归中国本身来阐释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它们被用来应对国际事务。

本文主要围绕三个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将分析文明型国家是如何超越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而行事的。第二部分是中國如何應對西方主導的世界觀。第三部分將前兩種觀點綜合為“文明型國家的現實政治”，進而概述一個關鍵的論點，即文明視角的分析最能解釋中國的崛起，因此，是中國重新詮釋了傳統國際關係理論，而非相反。此外，本文試圖從中國的現實政治中提煉出一種反映中華文明地位特徵的整體規律。

* 原著作者在此向导师安德鲁·卡波什博士 (Dr. Andrew Kapos) 表达诚挚的谢意，感谢他在本文成文过程中提供的宝贵思路和指导。本文译自丹尼尔·索卢卡 (Daniel Sorluca) 于 2016 年刊登于 Academia 开源学术平台的文章，详见 Daniel Sorluca, “Which IR Theories Best Explain the Rise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cademia, 2016, https://www.academia.edu/25096253/Which_IR_Theories_Best_Explains_the_Rise_of_China_in_the_International_System, retrieved August 20, 2022. ——译者注

① Weiwei Zhang, “The China Model: A Civilizational-State Perspective” (March 3, 2012), The World Financial Review, <https://worldfinancialreview.com/the-china-model-a-civilizational-state-perspective/>, retrieved August 20, 2022.

一、中国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

中国在历史上具有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观，外部世界是效忠于中心的属国。^① 这些属国在朝贡体系中向中心宣誓效忠。作为帝国，中国形成了某种现实主义的生存本能，建造长城以阻挡游牧部族的入侵。历经两千余年，中国的治国理政中包含了某种帝国现实主义。从世界大国到区域强国，要理解中国的兴衰之道，显然离不开文明分析。

中国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毛泽东时代得以保留。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着重提出共产主义中国是改版的中华帝国的观点，因为两者都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政府、任人唯贤的干部体制以及各种正式规则之上。^② 此外，共产主义中国与中华帝国在历史篇章中的相似性，还体现为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主张的现实主义类型，即革命现实主义。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中国曾尝试成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者。更进一步，这些想法最终导致了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试验。这些事件的发生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中断了中国重新成为超级大国的追求，使之多年都陷于地缘政治的孤立状态。^③

二、自由主义的现实政治

笔者认为，中国作为安理会成员加入联合国之时，国际关系学界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在他们试图理解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时，错误地将西方概念加于中国。中国顺势加入安理会后，参与到一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组织中。此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一步彰显了其对自由主义多边组织的支持，以及接受国际贸易理念和规则的意愿。尽管自由主义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的崛起，笔者认为，中国此举的目的仅是在日益国际化的世界保持其文明型实体的存在。中国支持安理会，中国秉持的理念是任何文明都应该有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并以此作为防范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取得全球霸权的堡垒。

或许这正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的关键所在。此次中美会晤结束了两国数十年的敌对状态，也见证了冷战背景下地缘政治关系的一次重大转变。^④ 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审时度势地采取了“三角均势”的务实策略，^⑤ 确保在漫长的文明复兴之路上稳步前行。中国在审度新时期形势后，决定避免与莫斯科发生冲突，并抛弃意识形态之争，以换取安全的环境。^⑥ 然而，中国仍旧顾虑美国会采用更加隐蔽的战略，并利用中国来击败苏联。^⑦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快速升温，而中美非正式联盟不仅限制了潜在的苏联霸权，也让中国更加紧密地融入国际社会。^⑧

① Tingyang Zhao, "Rethinking Empire from a Chinese Concept 'All-under-Heaven'", *Social Identities*, 2006, 12(1), p.35.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China Model: A Dialogue between Francis Fukuyama and Zhang Weiwei",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2011, 28(4), p.43.

③ 中国学界就导致中国在这一时期衰落的原因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在孤立是导致衰落的主要原因这一点上，是形成共识的。笔者主要参考了阎学通的观点，详见 Xuotong Yan, "The Rise of China in Chinese Ey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1, 10(26), p.35.

④ Evelyn Goh,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S Opening to China 1971-1974", *Diplomatic History*, 2005, 29(3), p.475.

⑤ Evelyn Goh,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S Opening to China 1971-1974", p.476.

⑥ Evelyn Goh,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S Opening to China 1971-1974", p.476.

⑦ Evelyn Goh,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S Opening to China 1971-1974", p.488.

⑧ Evelyn Goh,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Soviet Card' in the US Opening to China 1971-1974", p.499.

何种国际关系理论可以解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

自尼克松访华及邓小平主政后，中国抛弃了革命意识形态，走上了复兴中华文明的新道路。^①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则强调“独立与和平”。这样的意识形态将有利于国际及地区和平，也有利于世界各地人民各自的国家利益及其某些共享的共同体利益。此外，在新的思路指导下，中国外交政策也摒弃了国际主义，转而接纳了民族主义。^②在过去的40多年里，中国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与其他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中国已然是国际社会的一员。^③

三、为何需要从文明理论视角解释中国崛起

自由主义理论从经济权力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而现实主义理论则基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以及对南海地区的领土主张解释中国崛起。现实主义学者的立场，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具代表性。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终究无法抗拒超越美国霸权的诱惑，中国亦无法接受低人一等的地位，并会通过支持多极世界秩序来摆脱美国的单边主义。^④他断言中国不会和平崛起，正如美国会对任何威胁其主导地位的对手发起猛烈的回击一样。^⑤与之相反，西方自由主义则视中国崛起为东南亚以及全球经济的伟大机遇。借由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⑥等国际组织，中国崛起将促进地区稳定。鉴于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侵略式的帝国主义，前述关于中国的担忧可谓杞人忧天。“北京共识”强调经济发展、创新和民族自决，就是极佳的例证。^⑦

如前文所述，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迫不得已接纳西方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以期在当代世界立足。中国遵循西方国家治理理念并开展对外贸易，实在出于特别的考量。中国采取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并支持对多边主义，乍看与自由主义貌合，其本质实为在外交政策上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做出回应。中国的外交政策兼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仅仅是对美国统治地位的回应。这点显而易见，中国采取现实主义立场避免与美国霸权发生正面冲突，并通过非军事手段维护东南亚地区稳定，从而提供了一个自由主义选项，并利用这一软实力为中国的独立性明证；与此同时，中国还推进多边国际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外交政策只能从政策目的角度来解释，而不能看它是采取了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理论立场，亦不能以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视角观之。作为一个文明，中国追求自身的外交政策与世界其他文明体间达到一种权力平衡。这点在“北京共识”、中方在台湾问题的立场上和南海问题的主张中都有所体现。^⑧中国的外交政策正是对限制美国霸权、重拾世界治理权力的平衡的直接回应。作为文明型国家，中国传统上是现实主义的。

① Yaqing Qin,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2007, 7(3).

② Zhimin Chen,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5, 12(42), p.46.

③ Weiwei Zha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sight*, 2004, 6(4), p.224.

④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010, 3(4), p.387.

⑤ John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p.386.

⑥ 根据国际组织的一般定义，一套稳定地约束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的规则或规范即被认为是国际组织。因此以经贸合作协定为基础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应当可以被称为国际组织。——译者注

⑦ Joshua Ramo, “The Beijing Consensus”,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pp.11-12.

⑧ You Ji, “China’s Anti-Secession Law and the Risk of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006, 27(2), p.237.

但为了维持世界秩序，更为了回应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作为当今世界与美国和俄罗斯并驾齐驱的三大强国之一，中国极为务实地采取了自由主义。因此，回归中国自身，重新阐释理论，就显得尤为必要。就此而言，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仅是对各个具体事件的回应，若要解释中国，尚显不足。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习惯于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思考模式，因此对笔者在论文中提出的这一核心差异疑惑不解。笔者在文中提出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崛起，就需要采用文明理论。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提出文明在不断的挑战和回应中崛起的观点，^①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国际冲突源于文化差异。^②两本著作均推崇文明理论。正如亨廷顿所解释的，人类本质的组织形态是由各种文明所组成的，而西方人视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做法才区区数个世纪的历史。^③

因此最为恰当的看法是，每个文明都会循环往复地经历崛起、统治和衰败的周期。一旦采取这种视角，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庞大的中国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中国发源于古老的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兴盛，接受不同的意识形态或者策略，不仅仅是为了再次崛起，更是为了尽可能保持统治性地位。中国文明正再一次崛起，并非因为在军事上或者经济上与美国日益并驾齐驱，而恰恰是因为中国正处于文明发展的上升阶段。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中国在自身影响力范围内的地区采用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而在世界政治中采取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其实是对另外两个强国霸权野心的回应。

四、结论

总之，尽管中国人的思想中始终存在深刻的现实主义倾向，但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强加给中国则是不准确的。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超越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预设，它太过庞大，无法被这一学科下的类型所涵盖。然而，它知道自己必须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所以它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采用各种国际关系准则，最明显的是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根据自身需求来定义国际关系理论。因此，理解中国崛起，我们需要从文明理论的视角，以文明型国家的方式理解中国。

作者系悉尼大学青年学人

译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①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72(3).

③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24.